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蘇聯解體前後與「東協」關係的回顧與展望

doi:10.30390/ISC.199207\_31(7).0005

問題與研究, 31(7), 1992

Wenti Yu Yanjiu, 31(7), 1992

作者/Author： 龍舒甲

頁數/Page： 55-6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92/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7\\_31\(7\).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7_31(7).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蘇聯解體前後與「東協」關係的回顧與展望

龍舒甲

(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過去，蘇聯把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分為兩種型態：一是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的高棉、寮國與越南；二是跟隨資本主義工業發達之路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簡稱「東協」）成員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汶萊，後者於一九八四年始加入「東協」。<sup>①</sup>

由於蘇聯一直認為，美國的亞太政策主要是在配合其全球性戰略，以成立各種軍政集團與經濟性組織對她進行圍堵與隔離；因此，莫斯科的亞太政策，便著眼於突破這種長期性不利的形勢。一九八五年以前，蘇聯的東南亞政策，主要是集中力量於中南半島上的三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東協」則保持距離，以消除美國對此地區的影響力。

戈巴契夫擔任蘇共總書記後，重新檢討對外政策，體認到光憑軍事手段不僅無法取得亞太各國的信任，同時還會使自己停滯的經濟，在面臨著這些國家都表現出蓬勃的經濟活力時，喪失扭轉自己困境的時機。在評估了「東協」的經濟潛力與政治影響力後，遂希望能藉由與「東協」加強關係來幫她渡過難關，以及獲取「東協」的支持，使其在亞太地區更具發言權。

蘇聯於一九九一年發生「八月政變」後聯盟正式解體，戈氏宣佈辭去蘇聯總統與最高軍事統帥的職務，而使俄羅斯聯邦承續了蘇聯的國際地位與義務。

近半年來，俄羅斯「經濟利益優先與政治考慮」並重的對外政策，已使得世界各國及東協國家都對她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新加坡外長黃根成（Wong Kan Seng）曾經表示，「東協」歡迎俄羅斯聯邦在新的基礎下與其建立關係。<sup>②</sup>因此，本文擬分六個時期來回顧戈巴契夫時代蘇聯與「東協」的關係，並研析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與「東協」的新關係的發展與前景。

註(1)

JPRS Report: Soviet Union - International Affairs, FBIS, Feb.27, 1989, p. 2.

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

一九九一年一月廿日。

## 壹、守舊與創新時期

自一九七八年起，中南半島局勢的變化即成爲蘇聯與「東協」關係的最大障礙，而「高棉問題」更是開啟雙方長期冷漠關係的主要原因。當年十二月、「東協」各國與蘇聯的雙邊關係處於空前的低潮。不過，蘇聯却在這時轉變了以往強硬的敵視立場，進而對「東協」改採大致接納的態度：

- 一、認爲「東協」是受了美國與中共的壓力才制定出反越政策；
- 二、相信「東協」是由於內部「反動勢力」的影響，才會對中南半島上「革命的發展」發出反對的聲音；
- 三、對美國在「東協」加強追求各項利益的作法，視爲彌補她以往在中南半島所失去的影響力；
- 四、宣稱美國在極力推行「東協」的軍事化政策，並與中共聯合破壞蘇越同盟，以製造中南半島的不安；
- 五、認定並非所有的「東協」國家都是反對中南半島上的發展；並以印尼與馬來西亞兩國對中共威脅的恐懼心裏更甚於對蘇聯與越南擴張的緊張不安作爲證明。<sup>③</sup>

事實上，蘇聯爲了中南半島三國的軍經援助，得承受相當大的負擔，但在目睹「東協」各國豐富的資源，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及對戰略性水道的控制權的同時，却仍需和越、棉等國繼續緊密關係。更尷尬的是，蘇聯在越、棉等國的部署，不僅未能在全球戰略上阻却美國與中共在該一地區之影響力，反倒是更助長了此二者在本地區勢力的進展。

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在上任之初，依然遵循前人舊的政策與路線：一方面與中南半島三國維持著極友好的關係，另方面則繼續防阻美國與中共的影響力。其實，從前的蘇聯領導人也並非沒想過要改善與「東協」的關係，只是在意識形態掛帥下，他們認爲軍事性恫嚇才是真正有效的外交手段。因此，始終無法消除「東協」的不安心理。然而，這種方式與戈巴契夫理想中的「新思維外交」是背道而馳的。於是，戈氏遂開始推行他的理念，打算從降低軍事作用來促成「東協」與中南半島三國建立關係，以及接受蘇聯在此區域的合法性。

「東協」對這位蘇聯新領袖的想法反應冷淡，並對其計劃抱持著謹慎的觀望態度。只有印尼對蘇聯「和平共存」的提議先作出了反應，並開始和越南進行對話，以求解決高棉問題之道。<sup>④</sup>接著，其他「東協」的成員國也就高棉問題相繼贊同，

註③ Daily Report: The USSR, FBIS, Nov. 15, 1985, p. E1.

註④ Daily Report: The USSR, FBIS, May 6, 1986, p. 1.

所有涉及此一問題的國家都應坐下來談判。如此一來，戈氏更明白，以前蘇聯的作法根本無法化解僵局，唯有本務實原則才能創造新局。

## 貳、海參崴倡議時期

一九八六年二月蘇共「廿七大」的文件，四月蘇聯政府的「亞太聲明」與七月戈氏的「海參崴倡議」三次政策性宣示中，都提及要促進東南亞的和平與發展。然而，戈氏在海參崴時却未完全觸及高棉問題的情形，讓「東協」認為，蘇聯把它未免看得過於輕鬆。不過，印尼外長庫蘇馬特馬佳（Prof. Dr. Nochtar Kusumaatmaja）對戈氏的倡議倒給予正面的肯定，並表示這是蘇聯在亞太政策上的一大改變。<sup>⑤</sup>

蘇聯在「海參崴倡議」之後，的確也加快了與「東協」改善關係的步伐。就經貿而言，蘇聯除強調以平等互利的原則來發展彼此關係外，同時還鼓勵「東協」各國財團，廠商到蘇聯投資，設立商務據點，以擴大雙邊的貿易額度。

至於駐節「東協」各國的蘇聯外交官們則都配合政策，開始提出一連串拓展關係的建議。例如：駐曼谷的代理大使，不但呼籲加強與「東協」的關係，表示支持印尼所提有關把東南亞變成無核區的要求，甚至還暗示蘇聯會在美軍撤出蘇比克灣海軍基地時也相對地撤離金蘭灣。<sup>⑥</sup>駐吉隆坡大使則表示希望參加「東協」年度部長會議，以成為「東協」之「對話伙伴」的意願。<sup>⑦</sup>另外，其他的蘇聯外交代表也相繼發表了儘快展開結束高棉內戰談判的看法。不久，蘇聯外長謝瓦納澤（Eduard Amvrosiyevich Shevardnadze）便有了東南亞之行，其中還包括訪問泰國與印尼這兩個「東協」國家。總的來說，蘇聯外長親自向「東協」國家證明改善關係之誠意與致力於本地區和平與安定之決心，其意義自然重大：一是強調了戈氏的和平倡議；二是擴大了與「東協」的經貿範圍，有助於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的開發；三是打破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可是，蘇聯與「東協」在解決高棉問題上的歧見仍未消除，「東協」亦未改變其一貫的立場。<sup>⑧</sup>儘管謝氏之行並非全然如願，但所提出有關無核世界與禁止核試之建議，已獲得各國的認同與響應。

註⑤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6, 1986, p. 2.

註⑥ *Washington Post*, Aug. 8, 1986, pp. 17~18.

註⑦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 21, 1987, p. 5.

註⑧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Mar. 13, 1987, pp. E1~E4.

「東協」國家的外長們在戈氏上任後已陸續造訪過蘇聯。一九八七年五月，謝瓦納澤向來訪的泰國外長西提（Sitthi Sawetsila）作了尋求解決高棉衝突的承諾，<sup>⑨</sup>這也讓後來赴蘇的新任越共總書記阮文靈（Nguyen Van Linh）立刻感受到了蘇聯領袖們的壓力。五月十九日，阮氏在克宮表示，越南已準備揭開和中共與「東協」各國關係的新頁，並願討論一切有待解決的問題。<sup>⑩</sup>

八月上旬，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ed）從蘇聯帶回了戈巴契夫的保證，蘇聯打算撤除部署在亞洲部份的中程導彈，以維持與加強亞太地區的和平。<sup>⑪</sup>這項保證也顯示了戈氏對亞洲各國所共同關切的問題的重視，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決心。

九月上旬，菲律賓發生過軍事政變一週後，蘇聯外交部表示不贊成用暴力推翻菲國合法政府的看法。<sup>⑫</sup>此一聲明也結束了蘇、菲之間的低潮，並解除了柯拉蓉（Corazon C. Aquino）政府對蘇聯曾經道賀馬可仕（Ferdinand E. Marcos）連任菲國總統一事的不滿。

基於蘇聯的承諾與改善的誠意，「東協」各國的領袖們開始承認蘇聯是亞太地區的一部份，也同意在適當的機會讓蘇聯成為「東協」的合作對象。

一九八八年九月中旬，戈氏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Krasnoyarsk）發表他第二次關於亞太政策的演說。<sup>⑬</sup>他在講辭中所倡議的七點和平計畫已為蘇聯塑造了一個新形象，即蘇聯想在以和平手段解決衝突方面已率先行動。

以往蘇聯對於越南進兵高棉，向來是採取支持的立場，如今想與「東協」改善關係，自然無法避免「高棉問題」這個話題。戈氏相信，為解開此結局與中共展開會談，有助蘇聯與「東協」關係的改善；戈氏也明白，「東協」真正的希望是，蘇聯運用其影響力促使越軍撤出高棉。所以，蘇聯答應「東協」，將勸說越南當局、高棉的橫山林（Heng Samrin），以及其

註⑨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May 15, 1987, pp. E1~E4.

註⑩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May 21, 1987, pp. E1~E4.

註⑪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Aug. 5, 1987, pp. E1~E4.

註⑫ Izvestiya, Sept. 3, 1987, p. 4.

註⑬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17, 1988, p. 4.

他有關勢力，進行直接談判。同時，蘇聯也敦促河內和高棉四個不同派系、印尼與其他各有關國家儘快在雅加達舉行會談，討論高棉和解等問題。

在經貿、文化、科技合作諸方面，蘇聯也推展與「東協」的雙向交流，尤其是當俄羅斯對外經濟關係主管官員希庫連柯夫（Ye. B. Shkurenkov）於九月底抵達新加坡商討建立合資企業的項目與開發西伯利亞的計畫後，<sup>⑭</sup>「東協」各國對這個估計要二千二百億美元的投資市場均作了明顯的反應。

## 肆、逐步兌現承諾時期

一九八九年，蘇聯軍隊自阿富汗撤出，裁減了駐在外蒙古的軍隊，蘇中（共）關係正常化以及蘇美關係有了顯著的改善之後，與越南的關係也出現了極大的轉變，蘇聯不再以意識形態作為兩國關係友好的基礎。因此，「東協」才真正地改變了把蘇聯視為最大威脅的態度，尤其當蘇聯履行自己的呼籲，率先自金蘭灣撤出部分軍事裝備與人員時，「東協」的疑慮更是減少了許多。

九月初，真理報首先批露，越南將於九月廿一至廿六日展開最後階段自高棉撤走二萬六千名軍人的消息。<sup>⑮</sup>接著，蘇聯派出了一個由最高蘇維埃代表蘇雷曼諾夫（Olzhas O. Suleimenov）所率領的代表團前往金邊參加越南撤軍行動的儀式。<sup>⑯</sup>廿六日當天，蘇聯外交部在一項聲明中，對越南「負責而有建設性」的決定予以肯定，並認為這對消除地區性緊張和帶來東南亞和平與穩定有所貢獻。<sup>⑰</sup>

另一方面，印尼總統蘇哈托（Gen Soeharto）於九月中旬率團訪問了蘇聯，兩國元首在克宮共同簽署了一份極有歷史意義的「友好關係與合作基本原則聲明」。雙方在「聲明」中表示：將加強對話與合作；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脅作為外交工具；消除軍事與核武對國際社會的威脅；維持亞太各國發展與進步；全面解決高棉衝突問題，以確保東南亞的和平、自由與中立；共同致力於消除地區性衝突與政治因素所造成緊張等。<sup>⑱</sup>由於這份文件是在兩國建交四十週年前夕所簽署的，所以一

註⑭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頁1。

註⑮ *Pravda*, Sept. 6, 1989, p. 5.

註⑯ *Pravda*, Sept. 19, 1989, p. 4.

註⑰ *Pravda*, Sept. 27, 1989, p. 5.

註⑱ *Pravda*, Sept. 12, 1989, pp. 1~2.

般也都認為，蘇聯與「東協」的關係大抵已獲致穩定發展的局面。只是蘇聯仍朝著成爲「對話伙伴」的目標努力。不可否認，戈氏逐步實踐承諾的表現，已使得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在處於全球性緊張轉趨和緩之際，亦逐漸成爲日趨多元化的、既競爭又合作的，以及以防禦手段爲主的政治、經濟與軍事三種既互爲影響又相輔相成的形勢。<sup>⑯</sup>同時，蘇聯、中南半島三國與「東協」三者間的關係更是生動地凸顯著這個新形勢。

## 伍、務實與合作時期

一九九〇年是兩大超強國家結束冷戰的開始，雙方從消除意識形態的屏障與大幅度裁減軍備著手，所以對日後世界秩序與國際關係的架構都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接著，各國也相繼調整了自己的對外政策與對外關係。蘇聯是結束冷戰的主角之一，自然是在維護世界和平、調解地區性衝突，以及消除軍備壓力與威脅各方面都有著莫大的作用。

隨著冷戰的遠去，高棉問題就成爲整個東南亞地區首先要解決的任務。當蘇聯一直在營造和解氣氛，減少各有關國家的疑慮時，參與元月中旬巴黎和會的安理會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也就一致同意要遵守十六項原則，其中包括最主要的由聯合國監督越南軍隊全部撤離高棉、停火、以及中共與新、馬、泰等國同時停止援助「民主高棉」等原則。<sup>⑲</sup>

由於蘇聯也相當理解「東協」的心願與目標，於是就大幅地減少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活動與陸續地從金蘭灣撤軍。謝瓦納澤曾經明白表示過，要儘快撤除所有駐留在蘇聯之外亞洲地區的軍力；<sup>⑳</sup>所以，蘇聯不但向越南提出了蘇軍將於一九九二年以前全部撤離的保證，並也對金邊當局作了停止軍事援助的決定。另外在經濟方面，蘇聯還宣布了要逐步取消對越南的援助，以及對中南半島三國要採用硬通貨貿易的方式。<sup>㉑</sup>至於曾留在蘇聯的越南勞工，也於一九九〇年夏天的工人騷動之後，被遣返回越南。

這些務實的作法與合作的態度確實讓「東協」各國深感欣慰。當蘇聯副外長羅高壽（Igor' Alekseevich Rogachev）向馬來西亞表明意願，要求參加「東協」外長會議和其他亞太地區組織的會議時，馬國外長阿布哈桑（Datuk Abu Hassan Omar）立即答應去遊說「東協」各成員國與其他的「對話伙伴」，以同意蘇聯參加。

註⑯ 陶炳蔚撰，「九十年代的亞太地區形勢」，《國際問題研究》（北平），一九九〇年，第一期，頁五～七。

註⑰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Jan. 22, 1990, pp. 20～22.

註⑱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Sept. 4, 1990, p. 3.

註⑲ Alex Pravda, "Yearbook of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91 edition"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91), pp. 174～175.

當年底，戈巴契夫向日本朝日新聞表示，蘇聯將於一九九三年秋天在海參崴召開「泛亞高峰會議」，並邀請所有亞太各國的外長們參加。戈氏希望藉此機會能把蘇聯的亞洲部份與亞太地區完全整合為一體，並共同商討解決若干存在已久的問題。他強調，這項會議的目的在於把軍事化的亞洲改變為一個「穩定、和睦與合作」的地區。<sup>23</sup>

## 陸、全面建交與關係正常時期

一九九一年四月中旬，蘇聯駐泰大使要求泰國外長能再次協助蘇聯參加「東協」的年度會議，五月中旬，當「東協」肯定了蘇中（共）高峰會議是穩定亞太地區的重要因素之後，遂決定在六月間由「年會」主辦國馬來西亞出面，邀請蘇聯與中共的外長們以貴賓身分一起出席七月十九日在吉隆坡召開的第廿四屆「東協」外長會議。<sup>24</sup>正如蘇聯外交部太平洋與東南亞總管理局局長潘諾夫（Aleksandr Panov）所說，就實質意義而言，蘇聯從此不再被「東協」視為最大的威脅來源，反而會在共同解決本地區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以及鞏固和平與穩定局勢方面有著互利的合作前景。<sup>25</sup>

同時，率領代表團出席「東協」外長年會的蘇聯副總理馬斯留柯夫（Yuri D. Maslyaukov）亦明白表示，蘇聯正積極改善與「東協」國家的關係。他除了與六國外長在一起正式會談之外，並也曾分別和與會各國的重要領袖們進行了磋商。馬氏認為，蘇聯的公開性與改革的政策已使蘇聯極願和「東協」討論未來的合作。<sup>26</sup>

蘇聯認為，她一向贊同「東協」所關心的安全問題，而戈巴契夫對「東協」所作使東南亞成為「友好、和平與中立的區域」與「無核區」的要求也表示熱心支持。自然，「東協」各國便也相當關切蘇聯國內政情的發展。於是，當馬斯留柯夫向「東協」外長們提出援助與合作的要求時，就獲得了令他滿意的回應。例如：馬來西亞知道蘇聯外匯短缺，遂願意以兩年時間提供二億美元的貸款來協助蘇聯購買馬國的消費品，椰油與椰油製品。<sup>27</sup>泰國外長沙拉辛（Arsa Sarasin）則表示願與蘇聯提升關係，讓兩國副外長負責成立一個外長級的聯合委員會，以處理未來雙方經濟與政治合作的問題。七月下旬，馬氏順道訪問印尼時，受到了蘇哈托的熱烈歡迎。印尼不但願意提供蘇聯棉花與椰油加工廠，而且也同意自蘇聯進口棉花與礦石產品。

註23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Dec. 31, 1990, p. 15.

註24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May 23, 1991, pp. 20~21.

註25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July 18, 1991, p. 24.

註26 The Strait Times, July 22, 1991, p. 17.

Ibid.

。②8

八月中旬，蘇聯突然發生政變，在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的領導下，政變遭到失敗。戈巴契夫安返莫斯科後隨即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並解散蘇共中央委員會。不久，外長再度易人，由駐捷克大使潘金（Boris Dmitriyevich Pankin）接掌。九月下旬，潘金在第四十六屆聯大會議上指出：在解決某些包括像高棉問題在內的地區性衝突方面，已出現了令人樂觀的前景。②9

經過政變之後的蘇聯，其中央的權力已旁落到各個共和國的手上，但她仍在九月下旬因受到「東協」的支持，而獲准成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的第廿個成員國。十月初，潘金與汶萊外交大臣博爾吉亞親王（Prince Muda Mohamed Bolkiyah）在紐約簽署了兩國建交的聯合公報。③0至此，蘇聯與「東協」各國全面建交與關係正常化。

蘇聯爲了投桃報李，除了承諾要在一九九一年內，完全撤出留在金蘭灣的人員與軍事裝備外，同時還主動與安理會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就解決高棉問題，展開了最後階段的談判。其實，蘇聯的領導階層早已另外展開了長時間的安撫與說服工作，才會終於促成越、棉兩國同意聯合國的和平計畫。十月廿三日，十八國代表與聯合國祕書長在巴黎共同簽訂了政治解決高棉問題協定。蘇聯外長是第一位應邀發表講話的簽字國代表。潘金表示，巴黎文件中最寶貴的原則就是人權高於一切，高於任何利益，而這才是整個和平計畫的核心。③1副外長羅高壽亦認爲。由於蘇美關係，蘇聯與「東協」的關係，越中（共）關係的根本改善，以及蘇中（共）關係的完全正常化，因而才能爲和平解決高棉問題創造出良好的先決條件來。③2

## 柒、俄羅斯與「東協」的新關係

科茲列夫（Andrey Vladimirovich Kozyrev）於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一日被俄羅斯聯邦的最高蘇維埃任命爲外長後不久，即表示俄羅斯的對外政策須以國家與政府的最高利益爲依歸。他強調，當政府部門在擬定對外政策時，絕對是先清楚地了解自己人民的需要所在。③3

註②8 Ibid., July 26, 1991, p. 19.

註②9 Vjestnik MID SSSR (101), Oct. 15, 1991, pp. 2~6.

註③0 Gennady Churkin, "The USSR and Asia in 1991: Domestic Priorities Prevail", *Asian Survey*, Jan. 1992, p. 16.

註③1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Oct. 24, 1991, pp. 3~4.

註③2 Ibid., p. 3.

註③3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Oct. 17, 1990, pp. 60~61.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二日，蘇聯對外關係部與俄羅斯外交部舉行了聯合會議，會中討論了葉爾欽總統的命令：把蘇聯對外政策與對外貿易部門移轉到俄羅斯外交部。至此，蘇聯的對外政策與對外關係，乃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劃上了一個句點。

其實，就科茲列夫多次在不同場合的演說、報告、訪問談話以及對外交政策的意見來分析，俄羅斯對外政策的特點乃是優先考慮對俄羅斯經濟與政治的利益，至於意識形態與武力的使用，已不再是執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了。

除了在國內要繼續促進民主化與推動市場經濟的政策外，俄羅斯的外交目標是以四方面為主：（一）藉裁軍、限武來確保國家安全；（二）消除派遣軍隊駐紮國外的必要性；（三）建立陸鄰關係；（四）藉助伙伴與盟友的關係來發展與世界經濟整合的能力。<sup>34</sup>

另一方面，自一九九一年元月中旬起，「東協」的外長與財經首長們，即針對蘇聯解體後世界局勢產生重大變化之際，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而籌備了一次六國高峰會。元月下旬，六國元首一致強調，彼此應為明確目標而合作。強化經濟實力與政治安全，並儘快實現「自由貿易區」計畫，以應付未來世界經濟的挑戰。

其實，俄羅斯在「東協」尚未召開高峰會前便已注意到：以「東協」的資源，人力、技術、財力來評估，不難在一、二十年內發展為世界主要的經濟勢力之一。所以，葉爾欽總統在會前即致函六國領導人，表明了希望保持政治對話與拓展相當程度之經濟關係的強烈意願。<sup>35</sup>雖然「東協」各國對未來已建立共識，訂定了要達成的經濟目標和要儘快執行的安全計畫，但是俄羅斯相信在互信互助與長期合作方面，她與「東協」應可奠定穩固的基礎。科茲列夫已表示過，只要「第三世界」國家對俄羅斯人民的需要有利時，就應擴大與她們的關係。<sup>36</sup>如此看來，「東協」仍將是俄羅斯極力爭取與維持良好關係的主要對象之一了。

## 結論

以往，由於蘇聯支持中南半島上的共黨勢力而與東協集團疏遠。蘇聯對東南亞的政策，以及她與「東協」的關係，在戈巴契夫時代才算有了真正的改變與好轉。

<sup>註34</sup> Seminar Report, "Economics: The Key to Russia's Engagement in Asia," CNA, Apr. 1992.

<sup>註35</sup> 同註②。

<sup>註36</sup> Izvestija, June 21, 1991, p. 5.

冷戰結束後，各國又都面臨了如何在重建世界新秩序的過程中，界定自己的地位與安排自己的發展路線的重要課題。蘇聯之情況也是一樣，在後戈巴契夫時代，俄羅斯必須全新調整其與世界及亞太各國之關係。

蘇聯解體後，美國、日本、歐共體，乃至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國家，都更加強了與「東協」的關係。雖說俄羅斯的動作尚不及這些國家來得迅速，但是在她的「全方位外交」戰略中，東南亞地區是在她的睦鄰範圍之內。今後，就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對長遠利益考慮的角度來展望俄羅斯與「東協」關係的前景時，對有關加速中立區與無核區的建立；加強與中南半島國家的友好關係；擴大對話與合作的範圍；提升政、經合作層次；開放市場；消除貿易障礙，以及吸收外資與技術等方面，將有進一步的發展與加強。